

从百年党史汲取斗争力量

孙赫东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铸就的鲜明政治品格，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百年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提出学好党史、用好党史，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斗争智慧，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丰富斗争经验，才能更好不断夺取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透过百年党史看斗争

斗争是个哲学范畴，是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范畴，其本质就是认识、分析、解决矛盾问题，促进事物向前发展的过程。斗争是斗争主体为了特定目的而借助于某种手段或通过某种方式与客体之间所开展的自觉性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

斗争是党的固有属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生动体现，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要求。从政党诞生来看，资产阶级政党产生于资产阶级已经占统治地位国家政权的内部，虽有斗争，但更多体现是调和。无产阶级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跟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国家政权进行斗争的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诞生于国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从理论使命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斗争的属性，《共产党宣言》指出：“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斗争是党的光荣传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品格，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克敌制胜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其中敢于斗争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无数次奋勇拼搏、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的斗争精神，集中展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理想信念、崇高人格和坚毅品质，成为我们党鲜明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并不断生发，在不

同的时代赋予不同的时代内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百年流传、生生不息。

斗争是党的制胜法宝。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波谲云诡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必须依靠顽强斗争才能打开事业发展的新天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大党独有难题”这一新的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将其概括为“六个如何始终”，体现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的“坚守之难”、达成高度团结统一的“共识之难”、具备长期执政能力的“领导之难”、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的“动力之难”、及时发现解决问题的“革新之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调适之难”，破解这一难题必须以敢于刀刃向内的斗争胆魄进行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体悟百年党史敢斗争

“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尽管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斗争形势、斗争对象、斗争环境不断变化，面对艰巨的历史重任，面对难关险关的历史挑战，面对我们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党始终勇于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和自我革命，无所畏惧，敢于斗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

知重负重的担当。面对民族危亡之痛，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只为主义，只为信仰，勇扛救国重任，靠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走向井冈山的新生、从长征的艰险走向延安的崛起、从西柏坡的一方天地走向全中国的基本解放。面对国家积贫之弱，中国共产党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经济、军事上的严密封锁，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勇扛国重任，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基础，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面对人民生活之苦，中国共产党人打破思想桎梏，勇担时代重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勇扛富国重任，由此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勇扛强国重任，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给予了理论和实践新担当。

攻坚克难的勇气。破立国之险，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美帝列强的重压险境，一场敌我力量极不对称的战争，以“你打我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的斗争勇气，敢于亮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解兴邦之

难，将百年的屈辱标签狠狠踏碎。破踌躇之险，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改革道路的踟蹰难行，解放思想，一次次挑战这一理论禁区，不断艰难向计划经济体制宣战，解破题之难。1992年邓小平再次在事关中国向何处去的又一重大历史关头，为中国再次指明了方向，对“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这个羁绊改革发展的历史性难题给出了又一个准确解决的方法和答案。破发展之险，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三大攻坚战这一新使命必须答好的答卷，字字为先、实字托底，解治理之难，以前所未有的斗争豪情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自我革命的魄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党的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二个答案”。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就是一部自我革命史。从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重视和坚持党的自我革命，以刀刃向内的魄力和胆识解决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各种问题，不断以自我革命引领和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从1927年八七会议破危局，定方向及时清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与“左”倾教条主义相抗衡，破绝境，寻生路，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延安整风运动极力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破教条，引航程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防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于未然，破难关，答考卷；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破桎梏，承思想，转向实事求是，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破率率，刮毒瘤，开启了一场敢斗自己的自我革命伟大工程。

洞悉百年党史善斗争

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过复杂的斗争环境，经受过严峻的斗争考验，提升了我们党的斗争智慧，使我们党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党。百年党史有很多彰显斗争智慧的生动案例，这些典型案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成长，在斗争实践中壮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鲜明指出，“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从百年党史中抓牢斗争的关键点、关节点，把牢斗争的鲜明指向、站稳斗争的人民立场、掌握斗争关键要素，提升斗争的本领和艺术至关重要。

把准斗争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把准斗争方向正确方向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百年党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

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必须坚决维护核心。百年党史证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样一个大党，必须要有一个党心所向的核心。有了领导核心、全党维护核心、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没有领导核心、党的事业就必然遭受挫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翻开百年党史，实事求是贯穿我们党的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涵盖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也包括我们实行什么样的国体、坚持什么样的制度。

站稳斗争立场。斗争立场和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就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一切斗争为了人民、一切斗争依靠人民。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强调“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河北阜平考察时讲，“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要经常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坚持一切依靠人民。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做到集民智、反映民意、凝聚民心、赢得民心。

增强斗争本领。斗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实践中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一线、急难险重任务中真刀真枪磨砺，真正锻造成为烈火真金。要科学预见形势发展的未来走势，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好战略谋划，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要从百年党史的生动案例中剖析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斗争必胜的信念，在斗争实践坚持斗争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握好斗争的时、度、效，在斗争中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并赢得斗争胜利，不断汲取斗争实践案例的方法力量。

【作者系宁波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教授；本文系2023年第六轮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项目“党建引领乡村协商民主的耦合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相继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逐步侵占了香港地区。清王朝覆灭后，北洋政府、蒋介石国民政府多次试图收回香港，均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维护民族利益。在香港问题上，毛泽东着眼国内与国外大局，立足历史和现实实际，一方面坚定原则立场，反对不平等条约，坚持收回香港，实现祖国统一。另一方面，他根据形势变化，采取特殊政策，灵活运用处理香港问题。

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下，旧中国主权沦落，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伟大梦想，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之为之不懈奋斗的初心使命。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也是毛泽东处理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基点。

1949年初，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场节节胜利，英国政府预料中共将取得革命胜利，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事实上关系”。但同时又妄想继续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宣布“与中共当局建立友好关系，虽然这样做不会影响英国与国民政府的现存关系”。对于英国政府首鼠两端的骑墙立场，毛泽东坚决反对。在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次全会上，毛泽东深入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其中强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酝酿制定“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时，开始思考香港问题的解决。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香港问题属于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自然属于必须取消之列。9月29日《中国入政协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于旧中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一规定间接地表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处理香港问题的立场：不承认与香港有关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香港必须收回。体现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原则立场和坚决态度。

“暂时不动香港”

新中国成立伊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全面封锁，妄图扼杀新生人民政权。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将香港问题放到国内国际大局中考量，决定利用香港特殊地位，“暂时不动香港”，保持香港现状，作为新中国打破封锁，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国际通道”。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到访的苏联代表米高扬，在谈及如何对待港澳等历史遗留问题时，毛泽东说：“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的这段谈话为新中国处理港澳问题确定了基本思路。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香港近在咫尺，唾手可得，香港总督葛量洪哀叹“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人民解放军停止南下，勒马深圳河畔。1950年1月29日，在中英建交谈判中，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胡阶森(注：时任英国政府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一政策获得显著效果，为了维护香港的利益，1月6日，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西方对新中国的包围封锁圈被打开了一个缺口。2月，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再次指示，只要港英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至于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

毛泽东“暂时不动香港”的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一以贯之的。1956年5月28日，在听取广东省委关于香港问题的汇报时，毛泽东指出：“香港暂时还是不收回来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好处”。1960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毛泽东与他会谈时还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963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时再次谈及香港，他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收回是可以的。香港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三十四年租满，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

毛泽东“暂时不动香港”，保持香港现状的思想，对于保持香港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利用分化国际矛盾，发展中英关系，打破西方阵营封锁，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新中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基调。

“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英国占领香港以来，历史上香港一直与内地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大陆通往世界的通道要道。在香港问题上，毛泽东将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高度统一起来，在“暂时不动香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指导方针。

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明确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同时，指出在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上，要按性质和情况，在执行步骤上，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这个指示为新中国处理包括香港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指导方针。1957年，毛泽东提出香港不同于大陆，对香港应采取特殊政策，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9年，毛泽东再次表示，香港最好能保持现状，我们不着急将它收回，它现在对我们有用。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国际局势风云激荡，中国面临美苏两大阵营的巨大压力。这种形势下，香港的特殊作用更加彰显。六十年代初，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总结港澳工作经验，明确提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工作方针，即在暂不改变现状的同时，充分利用香港作为世界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的特殊地位和有利条件，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各级外交战略服务。

港澳问题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指导方针的确立，使大陆通过香港这一特殊通道保持了同西方国家及海外华侨的联系并开展经济贸易往来，对于新中国打破西方对华封锁，加强与世界经济交往，引进国内建设必需的物资、技术、资金和人才，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二战后，香港政治局势长期基本保持稳定，经济快速增长，同这一方针的实施也是密不可分的。

“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建立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1949年4月，发生英舰“紫石英号”炮击暴行，毛泽东在著文谴责的同时，宣布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新中国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稍后，在6月中国入政协会议筹备会和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再次重申这一立场。以此为起点，毛泽东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除了武力解决以外，还可以有和平的方式，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提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包括香港等历史遗留问题。11月，他致电在伦敦召开的英中会议，强调“中国人民欢迎一切加强中英人民友谊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亟需和平稳定的环境开展建设。195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家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他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中英之间‘没有根本分歧’，‘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根据毛泽东这一思想，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明确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原则和立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解决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1974年5月，在接见美国前首相希思时毛泽东还说，到1997年还有24年，香港问题“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在此之前大陆和香港和平共处，他明确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这里，毛泽东实际提出了和平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成为后来“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历史起点。

【作者系省委党校(安徽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毛泽东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与策略

汪勇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其历史启示

賈丙青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创建的全国著名革命根据地之一，在安徽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讲好宿州党史故事的重要内容。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战略部署的具体落实，它创建与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斗争缩影。

1938年5月，皖东北地区沦陷，党组织根据皖东北的抗日需求，指示江上青等人到皖东北开展工作。他们秘密发展党员、宣传抗日主张、培养大批干部，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39年党中央作出发展苏北战略部署，时任豫皖苏省委书记的张爱萍亲赴皖东北开展统战工作。张爱萍到皖东北，斡旋于皖东北桂系许志远和戴笠系统的盛子瑾之间，成功打出共产党旗帜，使皖东北地区变成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统战区。1940年除夕，鉴于皖东北的形势变化，张爱萍重返宿东石湖，雪夜奋战大柏圩，粉碎马馨亭的武力威胁，公开接管政权，成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1941年，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由于主力部队离开，在日伪顽匪“扫荡”下根据地缩小三分之一，

张爱萍奉命再返皖东北，经过40多天连续作战，收复失地，巩固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中共中央为加强华中地区的联系，将豫皖苏根据地和皖东北根据地合并为淮北根据地，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继续发挥着敌后抗战的堡垒作用，相继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拔除日伪军重要据点，遏制了日伪军对皖东北地区的“蚕食”和“伪化”，解放了数百万人民群众。

从辖区来说，根据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的行政区划，皖东北是以泗县为中心的国民政府安徽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区，位于苏鲁皖交界地带，处于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陇海铁路以南、京杭运河以西。从战略位置看，皖东北正处于华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连接地带，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展华中，开辟苏北”战略目标的前沿阵地，是新四军第四师东进苏北和西进中原的前进阵地，也是阻止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前沿阵地。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联系了华中和华北敌后战场，沟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团结作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中发挥着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历史启示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斗争，从沦陷区发展到根据地，辖区从7个县发展到20个县，建

立皖东北抗日民主政府，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连接华中和华北敌后战场，顺利实现了中央关于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为坚持华中敌后游击战争，扩大全国敌后战场提供重要支撑。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带给我们诸多宝贵启示。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回顾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的历程，由于战争形势紧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隶属关系变动频繁，最初属于豫皖苏边区；1940年8月，黄克诚率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北后，该地被划入苏北敌区；1941年5月，新四军第四师自津浦路西撤往路东后，皖东北再被划归淮东北地区，就是在这么频繁的变动情况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始终坚持党中央的领导，紧跟随中央的部署不掉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治能力，站稳政治立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发扬斗争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传承弘扬斗争精神，必须牢记八路军新四军和皖东北儿女在抗日战